

白宮故事

復旦大學圖書館
登錄號
070520

752.484
1014

亞爾索伯 (Joseph Alsop) 生於美國康納鐵克州 (Connecticut) 亞馮 (Avon)、像他的遠房
的表兄羅斯福總統一樣，受教育於格洛頓 (Groton) 及哈佛兩校。一九三二年自哈佛畢業後，即任
紐約論壇報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的記者，在新聞界第一次顯露頭角。一九三五年，他被
派為該報的駐華盛頓分局的記者，兩年以後，他與金納爾 (Robert Kimner) 合作，在該報上開一
『首都檢閱欄』，共同擔任撰述工作。金納爾生長於彭雪凡尼亞州 (Pennsylvania) 的史脫路茲堡
(Stroudsburg)，他進那地方的學校，後來到史瓦斯摩爾大學 (Swarthmore College) 去受高等教
育，而在費城開始新聞記者生涯。在亞爾索伯進論壇報本埠新聞編輯部那一年，金納爾也進了論壇
報的經濟新聞部，不久以後，他就成為關於垣街 (Wall Street) 消息的最有名的記者。在一九三五
年，他也被派往該報華盛頓分局的記者，擔任首都財政經濟方面的職務。金納爾現年三十歲，亞爾
索伯二十九歲。除開他們合作寫作的一欄外，他們也在生活雜誌，星期六晚刊及其他雜誌上發表過
好多文章。他倆也許是現在擔任新聞職務的最著名的兩個青年記者。



FUDAN

JP200000074695 復旦圖書館

原序

這是當代歷史的一個嘗試，而一篇序文，也是對於一個當代歷史家，自知甘苦，樂於發表的事。敘述現向未過去的事件，或現尚存在的人物，一個當代史家感到好多困難。他不能像已成過去的歷史家所誇示的一樣，大膽預示遠景，或宣稱他的著作完美無瑕。

時間必然會在將來調整遠景，透露詳細內容，及可能改變我們敘述中的基本事實的意義。同時我們只能說，事實每一項敘述，每一句描摹的渲染，每一句引證的話，是我們煞費苦心的結果。至於那些與他人無關的意見表示（這樣的意見表示，我們兩人希望使其盡量減少），則應由我們兩人負責。但其餘部分，我們都盡量收羅一切可得的文件及一切可信與可得的情報的材料，以供考證。

目錄

原序

一 刺激的反應.....	一
二 世界末日的開始.....	七
三 代替品是不夠的.....	三
四 希望的消滅.....	二
五 當戰爭到來的時候.....	七
六 未來的展望.....	九
七 後記——一九四〇年六月.....	二五

RWT/1197/15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晨二時四十分，白宮電話撥轉機上發着嗚嗚的聲音。疲乏的夜班接線生插上電線。傳來了說話聲音，『巴黎有電話，』於是傳來另一人說話的聲音，『^{新德}我可和總統談話麼？』接線生認識這有些異樣帶費城(Philadelphia)口音的說話是布列特(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的聲音，搖響勒痕小姐(Lo Hand)的電話，告訴她美國駐法大使有突如其來的電話。布列特是兩三個人當中，不必說明理由，不問晝夜什麼時間有權和總統說話的人。勒痕小姐說，『接通過去。』接線生搖響總統寢室的電話機，美總統在那幾天，本因焦慮睡不甚酣，立即起身，拿起了他牀旁的聽筒問。

『那一位？』

『總統，我是布列特。』

『嗯，布列特。』

『畢德爾(Todd Bunting，前美駐波蘭大使——譯者註)剛從華沙有電話來，總統先生。幾個德國師團已深入波境，戰鬥正在激烈進行中。畢德爾說，有轟炸機飛往華沙城上的消息。於是電話突然中斷。他在打電話前，曾費半小時，本想和你通電話。』

『哦，布列特，這事終於到來。願上帝保佑我們一切人。』

『談話更延長了幾分鐘之久。布列德請求總統設法『決定政策，以以色列他們在美國人頭上下蛋，』他的意思是請求交戰國兩方對不設防城市，施行轟炸。他們兩人又討論擱淺於歐洲美僑最妥善的辦法。於是總統說了一聲，『謝謝你，布列特，我現在得去召集赫爾及其他人會商，』於是總統掛斷了電話。

就在這樣僅僅了解他是什麼意義的平凡談話中，美國政府曉得了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消息。戰爭將來怎樣停止，什麼時候停止，那些國家勝利，美國人現在所曉得的以及世界各國國界是不是永遠消滅，現在沒有人敢說。不過有一件事是確定的；美國對二次世界大戰的政策，實在最重要的國策。在決定大部分政策白宮的喬治亞(Georgia Chantress)及灰敗有尖塔管起的國務部中，他們是在考量美國未來幾年的政策。

在國務部中，在這下有宛如蟻垤狀態，上有空襲恐怖的現代外交，與那自平靜的阿瑟(Chas. A. Arthur，爲美國第二十一任總統，任職期爲一八八一年至八五年——譯者註)時代以來沒有改變的背景，顯著不大調和的色彩。在那些華美鑲砌甚工的面住有大批黑人送信員的走廊中，英國駐美大使羅先勳爵(Lord Roebuck)匆忙地跑來討論世界大戰問題，其所造成的騷動，正如以前薩克維勒勳爵(Lord Salisbury)對於美國提出阿拉巴馬(Alabama)州領土要求遞交抗議一樣。但在國務部的神經中心區的海底電線室，收發機不定地發着響聲，帶來張伯倫達拉第表示的希望，德國外交部聲明，蘇聯透露的意見，長江流域最後發生的事件，及最後所加於巴爾幹的壓力等。

密碼的，複寫的，上有着『秘密』與『親啓』印章的，一切電報終日不斷地流入國務部。最先這些電報送入二層樓的南走廊，遠遠與國務卿赫爾及其助手副國務卿威爾斯(Summer Welles)及外次貝勒(Arthur Augustus Balfour)的隨員手中。然後再送到樓上，那地方有着勤懇工作的毛瑟(Jay Pierrepont Moffat)及斯(James Clement Dunn)專司西歐外交事務。再由那地方分送到各司，分成英國司，西班牙司，義大利司，或斯

干的那維亞司，有着下級官吏，把一切謠傳，一切事件，將來有可能演變的，分門別類的搜集起來。所以電報是刺激，美國的政策就是這些刺激的所產生的反應。

美國的反應，有些時候是慢的，有些時候是活躍的，但總是繼續不斷地進行着。日常問題，都由國務部專司這樣問題很靈活的機構去解決。至於較重大的問題，總是由視為慣例的會議制度解決，有時各司的司長也得參加，但時常總包括大部分的國務部的高級官吏在內。每天都有會議，通常皆在赫爾的那一間大而黑暗的房間中，那地方，一直到現在，在那些粗笨的傢具中間，似乎還有菲希 (Hamilton Fish 美國政治家——譯者註) 的鬼魂藏著。博學謹慎的毛發，提出了以往的例證，貝勒則大膽提供了新的原則，而赫爾則用了他的普通智慧判斷，事件就這樣定奪了。

同時，在白宮中，美國總統日常所收到的電報，有三束之多。大部分的日子，都有他的大使及公使送來給他的特別通告——如打電話，下屬回國帶來的報告，及由飛剪號帶回的信件等，布列德及其他幾個人，則不願如此，而寧願打電話給總統。普通，美總統把一天所收穫的消息，作為睡在床上時的讀物，睜着眼，草擬幾條大綱，預備明天怎

樣辦。但如赫爾室中的會議是重要的，也立即通知總統。於是，他離開有關係的公文，召集赫爾及威爾斯開會，他用短條子表示他的意見，以供國務部的參考。在會議的結果，就開始起草，而發電報的機器又發着響聲，訓令美國駐外使節，代表總統聲明強硬的態度表示贊同，盡其援助的任務，或暗示將予以責難。

有魄力，不顧成例的總統，是其主持人。在實際政治上有經驗，具有溫和的哲學家的外表，而內心却很固執的赫爾，是代表保守的勢力。他倆共同建議，而參議院，以代表人民大眾意見的立場，時常加以修正。但實際上既非總統，又非赫爾，也非參議院，制定美國外交政策。

電報實制定了美國外交政策。不閱這些電報的，參議員們也許是孤立派。但那些看到每周每月電報不斷流進來的人，不是為這種職務所鼓舞，即是為牠所痛苦。那些長長一大篇複寫打有案件圖章的文件，亦是證明美國是國際社會的一員；也是暗示任何威脅國際社會的勢力，可以威脅美國。最近的歷史。從沒有告訴一個在職的總統或國務卿，說他可以相信美國能不管世界命運而安然自存。

在這最近的幾年，電報業已證明世界其他部分的命運，搖搖欲墜。那些電報告訴美國，日本侵略中國，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西班牙發生內戰，德國在萊茵區武裝，奧國的滅亡，蘇台德區被佔領，捷克的滅亡，而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的黑暗的早晨，達到了悲劇的最高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於東波蘭剛收稜而刈餘殘梗尚遍佈的麥田中。對於這些刺激的反應是『不事戰爭』而援助民主國家的政策。筆者這本歷史的目的，就在描寫那項政策的造成，記載牠的失敗與成功，而推測牠的重大的未來的糾紛。

如果戰爭是長期的，那末將來一定包括很多問題。如果民主國家耗盡他們的現金，（他們在兩年以內即有這樣可能），美國是不是借給他們必要的金錢繼續戰爭呢？還是美國對他們封閉了武庫而讓他們冒險的危險呢？如果他們爲了別項原因，有失敗的危險——舉例來說，如德國空軍，比他們占優勢，美國要不要改變政策，不再遵守『不事戰爭』的原則而援助他們呢？美國要不要派遣軍隊，或者只派遣海軍及空軍，或者一無動作呢？並且當戰爭終了時，不問長期的，或短期的，問題又必重多。如果世界投入經濟混亂的漩渦，由目前情形看起來，這已不可避免，美國要不要拿出了美國的資源，恢復

秩序呢？如果這樣，用什麼條件呢？美國所認為的世界安定的先決條件，究竟是什麼呢？爲完成這一目的，美國要不要參加政治的以及經濟的解決呢？明確地講，美國究竟有怎樣一種戰後世界呢？又爲什麼美國願意有這樣一個戰後世界呢？

對於這些未來問題當中的幾項，一個人也許可以對於美國政策的制定者，提出可能的答案。例如，他們很明白他們所欲達到的是那一種的戰後世界，但當他們還不能曉得究竟要付怎樣大的代價，他們似已決定不派遣軍隊到國外，不參加最後的政治解決，與不參加不附有裁軍及公開貿易條件的任何解決。在這範圍以內，仍有許多不可捉摸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很難確定的條件。但研究美國外交政策的造成，可以從披露政策制定者的傾向，思想的規範上，行動的習慣上，把這可能的變化減少。也許這些傾向，要比之前政策制定者，處理未來事件所用的一切方策與範圍，更值得注意。

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危機，正如有人所說，是「我們世界的末日開始」，實為美國外交政策轉捩點。在慕尼黑以前，美國在世界政治上的地位，主要的是一個隨聲附和者的地位，有些太傾向於沮喪的姿態與警告的言辭。但從一九三八年八月末，當美國駐柏林大使館電告希特勒似已決心侵捷克後，積極與現實政策的造成，遂變為不可避免。在一時期中，所有和平的希望無不消逝；而慕尼黑危機的故事，也就變為美國政策制定者放棄「無為」態度的故事。

所以這一本歷史，將大部分討論美國國內的事件，因為只要對於歐洲事件發展有着普通知識，就夠了解美國的反應。簡言之，一九三九年八月末的形勢，是希特勒武裝萊茵區後走向最高峯的必有程序。英國在一度手忙腳亂地反對獨裁者的侵略後，接受了張伯倫的綏靖政策。法國也追隨於後面，有了兩個歐洲民主大國，犯了對希特勒綏靖的錯誤，集體安全的脆弱機構，就只存在於樂觀者的理想中了。

不久以後，綏靖者希望中所犯的錯誤，業已完全暴露了。慕尼黑不過是希特勒大舉侵略的中間一個停頓站。但即使慕尼黑的綏靖也不是一件易事，因為法國曾保證保護捷

克。因此，必須舉行談判，解決捷克問題，因為如果希特勒用武力企圖佔領捷克一部分，法國的保證，就得實行。在慕尼黑危機過程中，希特勒差不多要用暴力，進攻捷克人，也許因為如英國前駐德大使漢德生爵士 (Sir Neville Henderson) 在他的奇怪的「回憶錄」中所說，希特勒想在民主國家力量不充分時，與他們肉搏。這就是民主國家所欲避免的危險。所以，這不足奇怪，美國政策制定者以極端不安靜的態度，觀察事態的進展，即使在那時期，已經對於他們「無爲」的態度，透露不能繼續下去的徵象。

雖則美國當局不得不持重，但在慕尼黑時代，他們想有所作爲，却也並不是沒有這樣的企圖。從開始的時候，英法一方面發狂地想以和平的方法，滿足希特勒的要求，他方面公開地尋求美國用力量援助他們，把希特勒加以約束。美駐法大使布列特與駐英大使坎納第 (Kennedy) 差不多與美國駐德大使同時，向美政府提出了法國外交部，及英

國外務大臣哈里法克斯 (Lord Halifax) 的建議的報告。那項建議，對於未來緊急事態，保持「不斷協商」形式。經過慎重的考慮以後，美國當局加以拒絕。在國務會議席上，有一人對此發表意見說：「如果我們目前開始「不斷協商，我們將被視爲一個附屬

的國家，「而事前是不會知道真相的。」到了九月十三日，布列特又從巴黎打電話給赫爾，告訴他捷克已拒絕蘇古德 (Sudeten) 人領袖漢倫 (Henlein) 的最後通牒，張伯倫與達拉第正在考慮與希特勒早日在柏林舉行三強直接會議，他們很願有別的國家參加。赫爾於是出遊奧德萊 (Wodley) 古屋，該屋由史汀生 (Harry Stimson) 租與貝勒，去玩槌球戲，在球門之間，默想布列特所給他的暗示。晚餐後，他和總統討論這件事。雙方的決議是避不參加。在這次危機的初期，這種方式繼續不變。

美國顯著的徵象，是慎重的態度，這一方面是美國輿論的督促，一方面是歐洲形勢有一觸即發的可能，使美國無從追隨過問。這時期的口號是「不冒危險，不負義務。」大眾的情緒，貝勒在九月一日所編纂的呈交美總統的備忘錄，很能代表。貝勒那時警告美人不要被外交，或情感，而「搖動立場」，同時又勸告最冷靜的人——即使冷血的人，也要注意捷克問題。實際上，慕尼黑是美國無為政策最大限度的表現。

慎重並不足夠應付一切。危機的發展以可怕的速度增進。紐倫堡 (Nuremberg) 貝許茲伽登 (Buchsgeigen) 吞食毒藥 (Coco Party) 所來的電報中對於這些地方形容得最

象慘澹可怕。美總統坐在他的掛滿軍艦的圓形的辦公室內，堆滿了電報，在歐洲不斷來的電話中指示外交活動，有時對於慎重將事，感覺惱怒萬分。差不多每天，他要向布列特，坎訥第，駐德大使威爾遜 (Hugh Wilson) 及義國大使斐律浦 (William Phillips) 『我們能不能予以幫助呢？』而一致的答案是『沒有什麼事可做，除開負某種義務以外』。就美國的輿論講，負義務是不可能的。在國務部內，赫爾辦公室內會議，從來沒有停止過。從早晨至深夜，各大員討論收進來的電報，而互相詢問總統對他的大使所提出的同樣疑難問題。奧勒稱這些人是在『看守歐洲的臨終』。

到了九月廿四日，星期六那一天，希特勒及張伯倫達拉第貝尼斯 (Pence) 的提議及對案，開始走向危機的高峯。傍晚來的電報，一張一張地從密電室送給那些焦急的臨終看守人，表示談判正趨破裂。希特勒準備用武力佔領他的目的物，挑起戰爭。第二天早晨，在華盛頓沉悶的星期日的寂靜空氣中，赫爾威爾斯貝勒毛發，邵及其他一二個人，聚集赫爾的辦公桌旁，研究歐洲局勢。對於別國事件，僅作口頭干涉，認為與無為政策，並無不合。美總統已想到在最後一分鐘呼籲和平的觀念，所等待的，只是何時為最

適當的時機。這已變為無疑的事實了。貝勒與毛發，自願去起草總統理想中的文件。

貝勒是國務部的辭章家，同時也是其中一個能員。他與毛發草成了一篇動人的文件，志在由總統向「美國人民及其他各國有關人民」演說。那文件明白地宣稱：「任何由敵對行動造成的和平將毫無意義可言」。但美國對歐盡一些任務的誘惑極強。貝勒毛發的起草文件中，也含有一句盡任務的辭句：『如果有關雙方要求我出來擔任調解任務，以謀解決的辦法，我將予以接受。』

當別人替美總統起草時，他習慣上總先給他們他的意見的詳細大綱，指出應包括幾項重要點，採取怎樣的措辭，及指定文件的長短。有時他並且要叫起草人插入他的重要語句的一節或一章。不過在這一次中，他一早晨與歐洲通電話，他沒有時間預先和貝勒與毛發討論起草。當他倆起草完畢後，他們把草稿送給那些看守歐洲臨終的人，而趕緊另送一份給總統。他心中所欲達到的目的，他們並沒有把握住。他立即裁去如被邀請允許參加歐洲事件一節。他又命令措辭應更正式一點，而將公函改為正式外交通電，促歐洲領袖繼續談判，不得從事戰爭。另行起草，立即開始，費去了一日之久，有時在國務

部，有時在白宮。到了半夜，在他的舒適的書房中會議席上，總統修正最後稿中的辭句。於是他的疲乏的僚屬，走到國務部的海電室，去監視總統通電向歐洲拍發。電碼發完後，該通牒在星期一的早晨一點鐘傳至巴黎倫敦巴拉格(Parag)及柏林。

希特勒把凡爾賽和約亂說一頓來作答覆，到了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戰爭仍似乎立即就將到來。在早晨極早的時候，總統和他的重要顧問在他充滿陽光的臥房內匆忙地開會，決定兩項最後的姿態。總統寫了一封以個人出面的密函給墨索里尼，促其增加他的壓力，以求和平。貝勒威爾斯還回他們的辦公處，準備起草答覆希特勒的文件。

對希特勒的覆文，又引起了美國負有義務的問題。第一項計劃，是建議一個和平會議——威爾斯與貝勒兩人都指定九月二十九日為會議日期而以海牙和平宮為會議地點。該計劃並講起美國允許派遣一觀察員赴會，又講起美國願意參加任何與政治解決並行的經濟解決。但兩項草案送呈白宮後，赫爾堅決反對這項大膽的辦法。總統却予以同意，惟主張在歐洲一個中立地帶召集會議，討論和平條件。總統並訓令威爾斯用電話通知布列特及坎納第，要求他們向張伯倫及達拉第兩人覓取他們的反響。在那天下午，威爾斯